

二十世纪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的发现、整理与研究

苗怀明

《戏曲研究》2004 年第 1 期

—

摘 要：本文结合中国戏曲史学的创建与演进过程，对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的发现情况、主要特征、文献价值以及有关整理研究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。文章同时指出，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戏曲文献的第一个重大发现，对戏曲史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关键词：元刊杂剧三十种 古代戏曲 二十世纪

在中国古代，戏曲虽然是上至帝王显贵，下至平民百姓的主要娱乐形式，但它始终没有获得与经史同样的社会文化地位，没有学者愿意用治经史那样的功夫研究它，相关学术积累不多，文献资料散失严重。因此，在中国戏曲史学创建之初，文献资料的寻访、搜集和整理就成为当务之急。较之其他学科，文献资料的新发现对戏曲史学的巨大推动作用更为明显。可以说，整个一部二十世纪戏曲学史就是一部戏曲文献的发现史。在戏曲文献的诸多发现中，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的发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戏曲文献的第一个重要发现。

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是现存最早而且是唯一的一部元刻杂剧选本。该书原属李开先旧藏。李氏为明一代文士，同时又十分喜爱戏曲，早年“颇究心金元词曲”，写有《宝剑记》、《断发记》、《园林午梦》等传奇、杂剧多种。他还十分注意词曲的收藏，有“词山曲海”之称，曾选定《改定元贤传奇》，该书有残本传世，为现存最早的明人杂剧选集，今藏南京图书馆。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为李开先旧藏曲籍的一种。到清代，该书历经何焯、元和顾氏等人，转归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收藏。黄氏将其题名为《元刻古今杂剧》。光绪中，书为黄氏同里一藏书家顾麟士所有[1]。至民国间，书为日本人购去，后又为罗振玉所得。当时王国维正研治戏曲，对此书十分重视，其《宋元戏曲史》曾加以采用，后略加整理，成《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》等文，进行介绍，“元刊杂剧三十种”之名也为学界广泛采用。1914 年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请著名湖北刻书人陶子麟加以复刻，以《复元槧古今杂剧三十种》之名刊印出版。至此，《元

刊杂剧三十种》才广为学界所知。该书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共收元杂剧三十种[2]，但版式、字体并不统一，有四种大字本和二十六种小字本，剧名前称“大都新编”者三种、“大都新刊”者一种，“古杭新刊”者七种。对于该书的成书目前研究者看法还不一致，王国维认为“似元人集各处刊本为一帙者。然其纸墨与版式大小，大略相同，知仍是元季一处汇刊”[3]，但也有不同的看法，一些研究者认为这“也许是收藏者把它们装订在一起的”[4]。在这30种杂剧作品中，“其十三种臧选有之，其余十七种，皆海内孤本，并有自元以来未见著录者，有明中叶后人所不得见者”，而且即使是见于《元曲选》者，“体制、文字，亦大有异同，足供比勘之助”[5]。该书刊刻虽早，但刻工相当粗劣，错讹、脱落、增衍，随处可见，且全书大量使用俗体字，宾白不全，曲文不分，曲调牌名也时有疏漏，加上原版模糊不清，因此，阅读颇为吃力，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：“对于元剧修养有素的人，读此书也有时颇感吃力，更不必说初学。”[6]

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无疑具有多方面的价值，首先它是现存最早的元刻杂剧，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讲的：“凡戏剧诸书，经后人写刊者，往往改易体例，增损字句。此本虽出坊间，多讹别之字，而元剧之真面目，独赖以见。”[7]从这30种剧本中，可以真实地了解元杂剧的原貌，在与明刻本的对比中可以明了中国古代戏曲的变化演进之迹。同时，它的发现使当时人们所见到的元代杂剧数量增加了十多种，其中有不少为艺术水准较高的佳作，著名戏曲史家郑骞对此有很好的总结：“《元刊古今杂剧》的两大好处是：与《元曲选》重复的比较近于元人本来面目，在《元曲选》之外的都是佳作。”[8]这无疑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珍贵资料。其次是其校勘价值，通过其与《元曲选》同收的十三种杂剧，可以看出明人刊刻戏曲的增改情况[9]。即使是被认为是该书不足的俗体字、假借字太多的问题，也有人从文字学的角度肯定其研究价值，认为这是一部“所载简体俗字最多的内容又极有价值之古本要籍”[10]，“对于汉字演变史的研究，对于今天的汉字简化工作，也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”[11]。对于研究中国出版史，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。

最早对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是王国维。他有感于“原书次序先后舛错”，“无次第及作者姓氏”，因此“厘定时代，考订撰人”，成

《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》一文，按时代顺序将各剧重新排列，这一顺序为后来的整理者所接受。同时，其《宋元戏曲史》的《元剧之存亡》部分也反映了这一发现。此外，王国维因该书“世人恒苦其难读”，“其讹字，非熟于宋元词曲者，亦无自知之”，就“取其最佳者，重为写定”，成《写定元本元杂剧》系列，共整理出《新刊关目严子陵垂钓七里滩》、《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》、《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》、《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郎》等4个剧本，并对其作者、故事演变及艺术特点进行了简要的评介。《元刊小张屠焚儿救母杂剧》、《元刊本霍光鬼谏杂剧》、《元剧曲文之佳者》等文章也是利用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所写的[12]。

日本复刻本由于印数很少，国内研究者颇不易见。1924年，上海中国书店据日本复刻本照相石印，以《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》之名出版。这样，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才真正成为较为易见的读本。其后，不断有研究者进行校订整理及有关的研究。1935年，卢前为上海杂志公司编印《元人杂剧全集》，收入11种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为他本所无的剧本，并进行校订。建国后，隋树森编印《元曲选外编》，又将该书中不见于其他各本的数种收入，并订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。吴晓铃等编校的《关汉卿戏曲集》、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校的《关汉卿戏剧集》也都对其中关汉卿剧作部分进行了校订。王季思曾整理《〈诈妮子调风月〉写定本》。一些戏曲选集如邵曾祺选注《元人杂剧》也对入选的一些零折进行了校订。1958年，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四集将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影印收入，使日本复刻本及中国书店石印本中的一些文字错误得以更正。尽管全面整理校订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的条件已经具备，但上述这些校订都只是涉及其中的部分剧目，显得较为零散。

最早对该书进行全面整理校订者是台湾著名戏曲史家郑骞，他于1932年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，断断续续做了近30年，其间他还写了一些有关的研究论文[13]。直到1960年才全部完成，于1962年以《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为名出版。该书态度严谨，体例完备，次序大体依据王国维的叙录，稍做调整，并补题作者。每剧后都附有十分详尽的校勘记，注明据以参校的版本。书后还附有何焯据李开先抄本所校的《王粲登楼》一卷。其校订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：一是文字的校订，包括正误、补缺、删衍，共有3500多条；一是格律的校订，包括曲牌名目和曲文格律，有140多条；一是依据他本增补全曲16

支。在文字的编排上，还依照臧懋循整理校订《元曲选》之例进行了标明楔子、折数、宫调、用韵，区分宾白、曲文等工作。经过精心校订，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基本上达到了校订者的目标。“成为一般读者可以阅读之读本”[14]。

其后，大陆学者徐沁君在没有看到郑骞《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》的情况下，整理校点出一个新的读本，尽管早在1966年就已完稿，但直到1980年才以《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。该书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四集所收影印本为底本，以二十二种其它版本或戏曲选本为校本和参校本，进行了文字校订，标明楔子、折数、宫调等工作，在每折后写出校记，更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[15]。考虑到这些剧本的科白极简略或无科白，“对于了解剧中情事，颇为不便”，因此又在每剧前增加剧情说明和剧中人物表，以方便阅读。该书的优点据隋树森先生的总结，有如下几点：“每剧之前，皆有《剧情说明》和《剧中人物表》”、“参校群书，用力甚勤”、“校记征引广博”、“断句谨慎”[16]。

几年后，另一位戏曲史家宁希元所整理的《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》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。该书成于1976年至1980年间，由于出版的延迟，故得在郑骞《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和徐沁君《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两书的基础上，又加以修订、补充，并订正了前者的一些疏误，后出转精，成为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目前最为完善的一个校本[17]。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结合是该书的重要特点。该书的校勘也很有特色，作者根据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中大量方言异读的现象，从审音正读入手进行整理，具体做法是“由假借而得音读，由音读而得文义，由文义而得本字”[18]，并以宋元戏曲小说、隋唐五代变文、近世方言资料作为旁证。应该说这种校勘方法是适合元杂剧刊本的实际的，对宋元时期其它戏曲小说的校勘也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。该书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四集所收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影印本为底本，以明刊十三种有关的杂剧总集、曲选、曲谱为参校材料，并充分采纳前人的研究成果，进行了补题作者、统一剧名、增补楔子、折数、宫调名，断句标点等工作。凡增删改动，皆说明理由依据。每剧后都附有校勘记，每则校勘记前均附有简要的说明，对该剧的作者、版本、剧情、参校资料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，校勘记内容较其他各书详尽，除文字校勘的说明外，还往往举出一些旁证，并引述前人观点。因说明理

由的需要，还对一些文句进行了注释。这无论是对一般读者还是研究者都有方便处。

其后，王季思主编的《全元戏曲》和徐征等主编的《全元曲》也都将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收录，后者的收录原则是各剧“均分别附于各相关剧目正文之后，并参考郑骞、徐沁君、宁希元等先生的校本予以校订。仅见于该书的杂剧，则作为正文收录并予以注释”[19]。

经过研究者的不断努力，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的阅读问题已基本解决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正在展开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参见孙楷第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之四《校勘》，上杂出版社 1953 年版。

[2] 王国维因为书匣上黄氏题有“元刻古今杂剧乙编”字样，认为“此编既为乙编，则尚有甲编”（《罗振玉藏元刊杂剧三十种》，赵利栋辑校《王国维学术随笔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），“必尚有‘甲编’，丙丁以降，亦容有之”（《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》，《王国维戏曲论文集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）。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，现在研究者一般认为所谓甲编、乙编，不过是黄丕烈的一种版本分类。另，王季思先生认为这是郑骞的“发明”（王季思《〈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〉小记》，载《玉轮轩曲论三编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年版），误。其实早在 1938 年郑振铎就已指出：“黄尧圃藏书，凡宋元板以甲、乙别之。宋板为‘甲’，元板为‘乙’。此‘乙编’盖指系元板而言。”（郑振铎《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）

[3] 王国维《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》。

[4] 郑骞《从元曲选说到元刊杂剧三十种》，《景午丛编》，台湾中华书局 1972 年版。

[5] 王国维《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》。在不见于《元曲选》的 17 种杂剧中，见于后来发现的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者 3 种，实际上真正为仅见于此书的海内孤本为 14 种。

[6]郑骞《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序，台湾世界书局 1962 年版。

[7]王国维《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》。

[8]郑骞《从元曲选说到元刊杂剧三十种》。

[9]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早年曾进行过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与《元曲选》文字异同的比勘，可参看，见青木正儿著、隋树森译《元人杂剧序说》，开明书店 1941 年版。

[10]陈光尧《介绍影印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》，《北新半月刊》2 卷 22 号（1928 年 10 月）。

[11]李大珂《元刊杂剧的价值》，《戏曲研究》第 2 辑，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。

[12]以上文章见赵利栋辑校《王国维学术随笔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。

[13]郑骞《介绍元刻杂剧三十种》，《读书青年》2 卷 8 期（1945 年 2 月）；《从〈元曲选〉说到〈元刊杂剧三十种〉》，《大陆杂志》8 卷 8 期（1954 年）。

[14]参见郑骞《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序及校订凡例。

[15]有关该书的整理校订情况，参见校订者本人《〈元刊杂剧三十种〉校勘举例》一文的说明，《扬州师院学报》1983 年第 1 期。

[16]隋树森《读〈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〉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81 年第 4 期。另张增元《〈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〉补》一文，对该书有所补充，可参看，《文学遗产》1981 年第 4 期。

[17]另参见王季思《〈元刊杂剧三十种〉新校小记》一文的评述，《玉轮轩曲论三编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年版。宁希元《元刊〈古今杂剧〉中形声字的“省借”和校读问题》一文介绍了校订的体会，《兰州大学学报》1979 年第 2 期。

[18]宁希元《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》自序，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。

[19]徐征等主编《全元曲·凡例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。

《戏曲研究》（中国戏曲学院学报）2004 年第 1 期